



王 东 京

独董辞职是『积极信号』

公司设立了独董，当然对独董要有相应的激励与约束。在激励方面，独董不仅可在公司领取薪酬，也可接受公司一定比例的期权；而在约束方面，独董则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英美等国法律规定，独董应履行受托责任，如果因为没有及时揭露虚假信息而给股东造成了重大损失，独董应作相应的赔偿。

举个例子。若某公司刚上市股票便跌破发行价，对此董事会就有“不负责任”的嫌疑，会被投资者告上法庭。若法院判决确属董事会失职，独董也要分担赔偿，而且可能因此倾家荡产。不仅如此，独董通常是名人，名人的亮点容易放大，污点也容易放大。而名声有了污点，轻则口碑不好，重则遭人唾弃。可见，对独董的约束力度其实不小。

再转谈中国的独董。我国引入“独董制度”是1993年，而第一家企业，是在香港上市的“青啤啤酒”。当时学界也曾讨论过一阵，有寄予厚望的，也有不看好的。我属于后者，并曾公开发表过质疑文章。不幸的是，事实却被我言中。这些年我时常听到有人抱怨“独立董事不懂事”，甚至有人说“独董不过是个花瓶，中看不中用”。

说实话，听到这样的议论我并不觉得意外。用经济学逻辑推理，是必然的结果。前面说过，建立独董制度的初衷，是让独董维护小股东的利益。可目前国内独董的选聘，却是由董事长和大股东说了算。如此一来，公司独董基本都是董事长或大股东的熟人（朋友）。“屁股”指挥“脑袋”。独董怎会为小股东利益而得罪董事长和大股东呢？

最近有一份调研报告说，对公司高管决策提出异议的独董，近20年来寥寥无几；而2018年竟无一人提出质疑或反对意见。换位思考，出现这种现象也不奇怪。独董不在公司上班，对公司的了解仅限于公司财务资料；而独董的任免权又在高管层手里。假若你是独董，当你与高管层的意见相左时，恐怕也不会直陈己见吧。

事实上，这种现象美国也一样存在。当年安然公司负债累累，长期靠做假账虚增利润。2001年11月终于东窗事发，股价一落千丈，从85美元跌到了1美元。而此前29名高管早已抛出了中股票，赚了11亿美元，中小股东却损失惨重。安然公司也有独董，为何事发前三缄其口？原来，独董也得得了好处，倒戈转向了高管层。

回头再说“独董辞职”。前面我说“独董辞职”不是坏事。其理由很简单：此次独董密集辞职，是因为从法院对“康美”的判决中感受到了“责任”。10年前，国内也出现过财务造假案，可那时并未让独董承担经济赔偿，即使到了智能时代，无人驾驶了，也离不开人的操控，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司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闯了红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表明，我们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目的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对中央的这些重要判断，我们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一方面，相对于“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程度更重，贬义更强。另一方面，这里讲的是“红绿灯”，绝不是特指“红灯”，这里强调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 蔡之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不仅有助于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更大、更好、更有效的作用，同时也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要求。从资本的形成背景与作用方式看，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竞争等社会生产全部环节的二重性是资本的根本特性，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要立足于发挥资本在五大环节的积极性而抑制其消极性。

从生产环节看，资本的扩张具有二重性，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会遏制经济增长的潜力。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是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与工业革命的孕育和爆发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制度在激发整个社会生产积极性方面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在利润目标驱动下的大规模和快速扩张，极大释放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逐利本性使然，资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扩张往往不受行业边界束缚而呈现无序和过度扩张态势，这直接导致大量涉及基本民生行业出现了过度商品化现象，比如医疗、教育、养老等行业理应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公益行业类型，其功能定位是服务和满足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与发展需求，但在资本过度扩张的利益驱动下，这些行业服务人民的功能定位也异化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生活与生产成本将大幅提高，居民幸福感不仅会快速下降，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也将面临巨大冲击。

从分配环节看，资本的构成具有二重性，既有助于做大“蛋糕”，又会阻碍“蛋糕”的合理划分。从物质形式上看，资本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构成，而从价值形式上看，资本由一定数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前者为资本的技术构成而后者为价值构成。马克思将这种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的价值构成的关系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为了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在激烈的竞争中保存自己和击败对手，资本家总是竭力改进生产技术和采用新的生产设备，这使得代表技术和设备的不变资本比重以及资本有机构成会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生产效率和最终的产出总量也会随之提高，这是做大“蛋糕”的重要途径。然而，不变资本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增强，生产过程对劳动力总体需求逐渐下降，资本要素在分“蛋糕”环节的支配地位会越来越强，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也会逐渐拉大，最终会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出的那样，由于资本要素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自由市场经济导向的分配制度将导致固化的贫富差距格局。可见，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会使得“蛋糕”的份额不断向资本要素倾斜并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从流通环节看，资本的周转具有二重性，既有助于畅通加速经济体系循环，又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根据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决定资本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生产循环时间的长短，生产循环的时间越长，资本完成单次循环所需时间就越长，固定期限内能够实现的循环次数和得到的总利润就越低。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会通过不断扩大产业协作的空间范围、提高产业不同环节的分工程度、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交通技术来减少生产循环时间，从而完成更多的循环次数并获得更多的利润总额。然而，从资本周转的本质看，上

述手段并不能无限地压缩生产循环时间，其根本原因在于决定生产循环时间长短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资本的构成比例：如果用来购买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劳动对象和用于购买劳动力的流动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重重大，生产循环的速度就快；反之，如果用来购置厂房、机器、设备和工具等劳动资料的固定资本比重大，生产循环的速度就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资本进入了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本的实体经济，无论采取何种协作、分工模式和生产技术，相比于几乎不依赖于固定资本投入的虚拟经济行业，其在同条件下能够完成的循环次数和得到的利润总额将小于虚拟经济行业所得。因此，资本为了更快地获得更多的利润，固然会不断采取有效措施来打破经济体系梗阻、加快经济生产循环从而降低生产循环时间。然而，固定资本对生产循环时间下降空间的限制最终会诱导资本选择“脱实向虚”的发展路径。

从消费环节看，资本的积累具有二重性，既会为新产品的消费普及提供阶层基础，又会因为降低大多数人的收入而抑制整体消费。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由于资本家能够无偿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且不会将所有的剩余价值投入扩大再生产，这就意味着资本家很容易成为整个社会中的“先富”阶层。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看，这部分群体对新产品的消费普及往往会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是整体消费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然而，由于资本积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扩大再生产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背景下，资本家不仅会将获得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继续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还会通过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劳动力的正常工资水平都会面临巨大的下降压力。可见，虽然资本家能够通过攫取剩余价值来确保甚至大幅提高自身的消费能力，但资本积累追逐利润的根本目的和具体实现路径都决定了作为社会主要阶层的劳动者群体陷入收入不足的困境。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绝对少数的资本家的消费提升份额不足以抵消处于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下降份额，整个社会的消费规模将面临持续萎缩和长期不足的风险。

从竞争环节看，资本的集中具有二重性，既有助于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完善，又会引致高度垄断导向的竞争格局。与单个资本的壮大依靠资本积累这一过程不同，资本集中形成于多个资本的竞争过程，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生产效率较高的资本会通过战胜并吞并生产效率较低的资本来不断变大变强，而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资本也会通过信用工具来联合对抗大资本。因此，在大小资本的持续和反

复竞争过程中，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健全的市场信用环境就会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也会日益成熟。然而，资本集中不仅会出现于同一个行业内部，还会出现于多个不同行业之间，这就意味着大资本不仅会追求行业内部的绝对垄断地位，甚至还会试图实现对所有行业的垄断。就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于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时，或者合并于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时，集中才算达到极限。”因此，无论是上述理论分析，还是大资本在现实世界中的高度垄断竞争策略，都在证明这种资本的集中导向会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格局产生扭曲影响。

面对资本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竞争等社会生产全部环节的二重性，总体原则应坚持“用其利、去其弊”，在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清晰界限，赋予资本在市场发展决定性作用领域内的高度自主权，同时也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过度扩张至民生行业；在分配环节，既要鼓励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及时和广泛应用，同时也要加快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工资增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不同类型要素的分配差距能够控制在合理范围；从流通环节看，既要加快完善税制结构，降低实体经济税负，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利润关系，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引导和规划实体产业的空间梯次布局，避免“脱实向虚”的现象过早和普遍出现；从消费环节看，既要允许和鼓励资本要素拥有者的超前和引领消费，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扩大内需战略、房住不炒战略，培育更加健康的内需动力；从竞争环节看，既要允许和尊重资本在市场中展开合理竞争，围绕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和产业链控制力而实施的并购策略，也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选择“为了垄断而垄断”的野蛮生长模式。

总之，资本并非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但资本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和最终效果仍然会对国家发展的质量和成敗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制度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把握资本的二重性，引导资本更积极、更有效、更合理地发挥作用。



资本红绿灯

□ 乌裕尔

杀人凶器，发挥的就是彻底的消极作用。

资本作为工具、作为重要生产要素，谁来决定它发挥作用的方向呢？自然是掌握资本的人，掌握资本的人是一种特殊的人，也是世界有本事有智慧的人，但是无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是人有人的弱点。人性的弱点有很多，突出的比如说贪婪，就是人性的一大弱点。资本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是导致资本野蛮生长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与其说资本在野蛮生长，还不如说掌握资本的人的人性弱点在加速膨胀。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自然要设置“红绿灯”，要有硬约束，要建立一套制度，但是从掌控资本的人的角度来讲，时刻警惕、片刻不放纵人性弱点的膨胀，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曾有人与我探讨，人性和党性是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人性是有弱点的，而党性是能够克服人性的弱

点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不停强调要加强党性修养的一个根由。

我们的创造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是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搞的是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者是与别的什么主义相结合的市场经济，那就不仅不伟大，而且是邪路、歪路了。资本有方向，资本还得姓“社”，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健康成长，偏离了这个方向膨胀，就是野蛮生长。

设立红绿灯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所有车辆最高效率的通过。在路口，资本既要看到绿灯，也要看到红灯；既要看到红灯，更要看到绿灯。要牢记红灯停、绿灯行，深刻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同时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深意所在。



行车到路口，红灯亮了，但是车子并没有停下来。我们会说，这辆车闯红灯了。这样说不对吧？当然对，明明就是这辆车闯红灯了嘛。但是，也不对，因为明明车子是由司机操控的，如果离开了司机，再好的汽车也是一堆钢铁而已，只能是一件物休，即使到了智能时代，无人驾驶了，也离不开人的操控，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司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闯了红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表明，我们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目的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对中央的这些重要判断，我们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一方面，相对于“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程度更重，贬义更强。另一方面，这里讲的是“红绿灯”，绝不是特指“红灯”，这里强调